

蒋经国



蒋经国论

曹聚仁 著

父亲曾说：“历史真是说不得一个‘假使’的。”这正是所谓历史的偶然性和必然性之间的吊诡。但如果真那样，当然也就不会有今天的《蒋经国论》了。

——曹雷、曹景行

人民出版社

蔣經國

曹聚仁 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蒋经国论 / 曹聚仁 著. -北京: 人民出版社, 2009

ISBN 978-7-01-007770-3

I. 蒋… II. 曹… III. 蒋经国 (1910~1988) - 评传 IV. K827=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029380 号

蒋经国论

JIANGJINGGUO LUN

曹聚仁 著

责任编辑: 刘丽华

特约编辑: 姚 恋

封扉设计: 奇文云海

出版发行: 人民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(邮编: 100706)

网 址: <http://www.peoplepress.net>

邮购地址: 北京市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邮编: 100706

邮购电话: (010) 65250042

印 刷: 北京合众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版 次: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2009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开 本: 720 毫米×970 毫米 1/16

印 张: 14.75 彩插: 12

字 数: 183 千字

印 数: 10,000 册

书 号: ISBN 978-7-01-007770-3

定 价: 38.00 元

著作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序言：《蒋经国论》

曹 雷 曹景行

父亲的《蒋经国论》先有上海版（1948年），那可能是中国第一部论述经国先生的著作。五十年代后父亲移居香港，不几年又把《蒋经国论》几乎重写了一遍，才有台北政要争着去“太子道”而避开“皇后道”的譬喻。父亲写沪版和港版时，处境有很大的不同，心情和用意也有异，但已是四五十年前的事情了，论者和被论者都早已作古。

这不是一部传记，只是作者将他不同时期对蒋经国的评述集成的一个集子。1997年我们将两版合为一册，首次在台湾出版，这样，反而可更清楚地让读者知道曹聚仁心中的蒋经国是什么样子的。这次，又是首次以简体字版与内地读者见面。

六十年前抗日战争烽火初起，父亲从书斋走上战场，当起中央社的战地特派员，主要游走在长江以南的第三战区，才有机会到赣南与蒋经国先生相识、相知。后来更在赣州安下了家，为经国先生主办《正气日报》。在经国先生那里，父亲是客卿身份。经国先生可能视他为友为师，却从来未把他当作自己的下属。母亲邓珂云七十多岁去世前，还记得那年春节，经国先生让勤务兵挑着一担年货，随他大年初一清早踏雪上门拜年，一进门他就抱起才牙牙学语的曹雷。

但父亲毕竟只是书生，虽然是一个对政治有兴趣的书生。经国先生周围一旦有人玩起政治派系的游戏，也就到了书生出局的时候。即使如此，父亲在辞去《正气日报》的工作后，仍然有不少机会同经国先生挑灯夜谈，直到1949年后，一个去了台北，一个去了香港。父亲两个不同版本的《蒋经国论》，正是那个时期的产物。在他的回忆录《我与我的世界》及《采访外记》中，对他们两人那段时间的交往也有不少的记录。

五十年代以后父亲与经国先生的关系，或许是许多人最感兴趣的，但也是最难弄清楚的。从已经公开的史料中可以知道，从五十年代中期开始，父亲确实成为台北与北京的沟通管道，台北那头应该就是经国先生。父亲晚年常自喻为波兰小说家亨利克·显克维支（1846-1916）笔下的“灯台守”，他无非就是守在香港这块地方，等待国共两党“床头打，床尾和”。等到贫病交加的暮年，父亲终于留下“经国不愿当李后主”这样的话。

父亲是在失望中去世的，比经国先生早走了15年半。不久前，一位熟知经国先生脾性的人士告诉我们，经国先生做事从来不留下片纸只字。那么，父亲与经国先生最后二十年的交往中究竟还有哪些事情，很可能会成为永久的秘密。

大陆上一两位以“曹聚仁研究”出了名的人，只不过凭着少许已经公开的史实，加上许多自己的想象或以讹传讹的奇闻，不断编写长篇文章，当不得真的。海外也有人声称自己曾参与国共之间的事情，但以他们当年的资历和工作，最多只能知道一些皮毛，也当不得真。

历史中的因缘往往是奇特的。没有与经国先生的那层关系，父亲下半生的日子可能会不相同，甚至我们做子女的也会有另一种处境。父亲又是最早使刘宜良（笔名江南）先生产生写《蒋经国传》的念头的人。我们后来整理父亲遗物时，就找出几十封两人当年的通信。刘宜良的这

本书（指《蒋经国传》）使自己遭到杀身之祸，而他的死又完全打乱了经国先生的接班安排，李登辉才有由副“总统”扶正的机会。有时不禁会问，如果父亲与经国先生无缘在赣南相识，蒋家今天会不会又是另一种遭遇，台湾会不会也是另一种局面。父亲曾说：“历史真是说不得一个‘假使’的。”这正是所谓历史的偶然性和必然性之间的吊诡。但如果真那样，当然也就不会有今天的《蒋经国论》了。

父亲与经国先生的因缘似乎还在延续。景行这些年经常到台湾采访报道，一次在蒋孝严先生（当时还叫章孝严）的办公室里，他对当地媒体记者介绍景行时说“我们是两代世交”，那些小记者听了有些发呆。后来，他带着景行去新竹看他童年生活的地方，又去祭拜抚养他成长的外祖母。没过多久，蒋孝严就到奉化溪口“认祖归宗”了。

（2008年8月）

上海版前记

半月以前，我用了“丁舟”的笔名写了十多篇《谈蒋经国》的文字，友朋之间，相与揣测探听，纷纷告语，说穿了我的这幕戏。这儿，索性恢复了本名，免得大家再费神去猜测。我所以用一个笔名来写，原想保留一点批评的自由，因为我曾替蒋氏在赣州办过《正气日报》，在中国的传统上，便失去了说话的地位。说他好，容易被有些人看作是捧场，捧场既非我的擅长，而蒋氏又是一个最不爱被捧的人。加点批评，又容易被人看作是说坏话，而我也没有说好说坏的兴趣；王船山自叙《读通鉴论》，谓：“流俗之所讥，而大美存焉；事迹之所阙，而天良存焉。故春秋之作，而岂濯濯諄諄，取匹夫匹妇已有定论之褒贬，曼衍长言以求快俗流之耳目哉！”一个对历史有兴趣的人，在这些方面总不肯随便马虎的。我乃托之于生疏的笔名，想来发挥一点“中有所感”的繁念。友朋们一定不让我这么做，我也只好复原。因此，把文中有些口气不合之处删改掉，大体看来，前后已经一致了。

朋友们，积极鼓励我编刊这个小册子。大家都认为民间的神奇传说，才是蒋氏社会政策的大敌。我所写的，至少可以解消社会上的种种误解，使大家明白蒋氏的社会、政治、人生的观点。我努力向这个

方向去做，虽未必满足朋友们的期待，但此中没有身边琐事，也没有内幕新闻，更没有什么罗曼史穿插于其间。我自信这是一部“一本正经”的书。七年前，我曾写过谈新政的短论，尚论古人，以王安石新政为论题，骨子里说的什么，大家都会明白，因此，把它排在头里。接在《谈蒋经国》之后，编上几篇当年报导蒋氏在赣南的故事，这便是本书的正编——《蒋经国论》。友人周维新先生，当年曾写过一篇谈新赣南政治的文字，颇有份量就附在正编，再把蒋氏和记者谈新赣南建设的专栏稿放在最后。

我还另外编了一份蒋氏政论举隅，第一篇乃是他的政治观社会观，二三两篇中则是他的人生观，《夜宿虎岗有感》，可以代表他对自己的总检讨。

这部书，或许使读者非常失望。可是我眼中的蒋经国，有骨有肉，实在是个常人，并无奇迹可写。明知太缺乏传奇性的书是不能满足大家的好奇心理的，然而枉尺以直寻，并不是我做的事。“君子之是非终不与匹夫匹妇争鸣”的呢！

是为记。

1948年10月1日

香港版前记

1939年冬天，我们溯赣江而上，到了赣州。那时，蒋经国先生初任赣南行政专员，推行新政。泰和人士（泰和乃江西战时政府所在地），以疑虑眼光在注视他的施为，给他带上红帽子。当时，我写了一篇《一个政治新人——蒋经国》分刊《金华东南日报》和香港《星岛日报》。这篇通讯，先后有英法俄译文，影响颇大。接着写了《蒋经国传奇》、《瑞金心影录》那几篇通讯，都是替他的新政作解释的。我另外写了一篇《新政漫谈》，这才说了我的政治观点，我以为蒋经国虽是标榜王阳明，他的新政，乃是属于王安石那一型的。后来，我在赣州，替他办《正气日报》，我就很少写有关他的新政的通讯了。写新赣南新政的朋友，如《大公报》的徐铸成、杨刚，《国际新闻社》的孟秋江，看法也和我差不甚远。只有刘思慕（《衡阳力报》总编辑）到过赣州，并没写什么。1944年，周维新写了一篇《评新赣南政治》，刊在《南平东南日报》，褒贬互见，许多话刺痛了蒋氏的心。

胜利之后，我从江西到了上海，朋友们殷殷以赣南新政为问。我就写了一篇《蒋经国在赣南》，刊在上海的周报，要算第二次的报导了。后来，蒋氏奉命在上海督导金元券的发行，他又成为海内外注意的新闻人物，若干荒唐的传说又浮了起来。我才开始在《上海前线日报》写《蒋经国论》，连载二十多天。后来，就把《新政漫谈》当作引子，汇刊了一本小册子，题名《蒋经国论》，附上了周维新的《评新赣南政治》和蒋氏的《夜宿虎岗有感》，还有几篇蒋氏的演讲词，那是第三次的报导。这一本《蒋经国论》，仍以《新政漫谈》作引子，至于报导蒋氏的言行，比较广泛而客观。不过我的观点，一直没改变过。我写这一类报导文字，总把自己当作百年后的史家来着笔，力求撇除政治的成见，知人论世，放在时代环境中去理解他的。有人设想我的报导，一定剧秦美新，那就想错了。

蒋氏之为人，是给中国这个官僚主义的政治社会拖坏了的。他虽是在苏俄大革命时期受长期的社会教育，可是，一回到了中国，就变成中国型的官僚。生活方式，也不免沦于腐化，以至于他的朋友，慢慢离开了他。因此，我写到了《阿契理司（今译阿喀琉斯）的脚跟》那一节，不禁投笔三叹，克林威尔（今译克伦威尔）说：“画我须似我！”我又怎能不写下去呢！我所写的，力求其正确、真实，蒋氏的政治前途，正在开展，我希望他从深渊中浮起来，将来不要再写这一类使人短气的文字才好。

二

中国这个社会，历史的负累太重，很快就把每一代的青年都拖了下来，不独蒋经国一人的命运如此。我初有知识时，就听到了袁克定

的故事；那位公子，急于要做皇太子，甚于曹子桓，而学识文艺，却又差得很远。袁家另外一个有名的公子袁寒云，我认识他时，不过四十来岁，在上海做做诗，写写字，玩玩女人，抽抽鸦片，自比曹子健，小有才名而已；老式的大少爷派头，不足道也。后来，我们所知道的（民国初年）四公子：卢筱嘉（军阀卢永祥之子），就像戏台上的花花公子；段宏业（段祺瑞之子），只会下围棋，都是要不得的。比较好一点的，要算张孝若（实业家张謇之子），但在发展实业上，也没有什么了不得的成就。张学良一生，既荒唐，又胡闹，后半截落得这场莫名其妙的结局（指遭蒋介石软禁数十年之事），也可说是自作自受。蒋百里先生有一回谈到张学良的故事，他形容这位公子的神经过敏，丧魂失魄的样儿，不禁为之失笑。孙哲生（孙中山之子孙科）这一位公子，要算懂得一点事，读得一点书，有点政治家的风度，然而，也逃不了公子的性格。莎士比亚的名剧中，有哈姆雷特王子其人的，也许公子阶层的人，逃不了这么一种闪电型的性格吧！

要把第二代的公子教育起来，原是儒家政治理想之一。教育“太子”使之成材，于是为之相而行其道，这就不以致太平。不过，诸葛亮毕竟扶不起刘阿斗，“此间乐不思蜀”，这样的第二代，正是政治上的悲剧！近百年中国政治史上，真正把第二代人教育起来的，也只有曾国藩一人而已。（曾国荃那一家就不行了。左宗棠和李鸿章，也不曾把下一代教育起来。）曾国藩可说是有气度的人，他把曾纪泽教育得比自己还胸襟开朗些，最不可及，我们只要接近曾家的四围人物，都还有点曾氏的气度与学识（如吴兴的俞家、江家，上海的穆家），该是最了不得的成就。

我们读了蒋氏（蒋介石）的传记，他们那一群人，似乎也在以曾国藩自期。以蒋氏（蒋介石）的地位、声望和时机，自可以和曾

氏争历史上的地位。然而，他之为人，既无以继孙中山的大业，连做一党的领袖，都不十分成器的。这位在莫斯科吃黑面包成长的公子，照理应该比吃白面包的曾纪泽高明一点。一开头颇有那么一点气概，连毛泽东听了都吓了一跳。谁知越变越不成，越变越成为他父亲的儿子呢！

三

语云：“君子爱人以德！”我自己确对于政治斗争毫无兴趣，我更无意于做陈布雷，陈布雷的结局，更不足为训。可是，为了国家民族，对于这个和国运相联系的公子，却寄以深切的期待。过去多少错误，已经无从挽救，来日方长，在大时代的转角上，总该好自为之的！我还记得在南京鼓楼外的一角上，徐季元、杨明、黄中美诸兄都在一起，还有一位和我自幼同学的黄兄，大家感慨了一番。徐兄对我说：“我们跟他（经国）在一起的，说得太多了，他也听厌了！还是你们外来的，多说几句吧！”他的意思要我多说一点。第二天，经国先生到《前线日报》南京分社来看我，我就率直地说：“国民党的王朝，就看这六个月了！这六个月没有办法的话，你们的天下是真的要完了！”不幸而言中，蒋家天下，果然在那年十一月开始崩溃了。我是和桃花扇中的柳敬亭一般（柳敬亭本姓曹），将五十年兴亡看饱，一肚子感慨的！这一小册子，也就是孔云亭写桃花扇的一样心怀，“剩魄残魂无伴侣，时人指笑何须躲”呢！

大陆解放以后，我在上海还看见了一些当年在赣州替经国做事的朋友，这些朋友的离开对于经国，该是最大的教训。他们若不是觉得经国这一边的天下真的绝望了，是不会走开的。G兄北行的前几天，

和我还谈了好几回。G 兄年轻时期，也是社会革命的激进派，后来成为 CC 系的中坚干部，最为陈果夫所器重。新赣南建设时期，他是一心一意替经国打天下的，后来也到关外去做过民政工作。他也和我一般，看着一个政府新人的腐化与衰老的。一个四十多岁的人，乃竟如入暮境，想到当年“青年的天是不夜的”的吼声，恍然是一场旧梦呢！我们的心愿，响着的，还是桃花扇中几句下场诗：

当年真是戏，今日戏如真；
两度旁观者，天留冷眼人！

客座谈政^①

——政术·人言·用人及其他

天下制度，无全利而无害底，但看利害分数如何。

——朱熹：《论治法》

昨日，高理文先生语我：“建设赣南，新猷初展，缅想前贤，遗规可寻。我们在搜求王阳明当年治赣的方略。”我以为国人谈政，喜“因”而不喜“革”。王阳明的治赣，还是偏于“因旧”的，不足为法，要谈政治改革，当从王安石的新法中去借镜。因尚论古人，漫谈新政。

一、几件史实及论辩

宋神宗熙宁元年（按：1068年）十一月，朝伤国用不足，诏学士议。……王安石曰：“……国用不足者，以未得善理财者故也。”

^① 港版名为《新政漫谈》，此文表明了曹聚仁对蒋经国所施行政治的个人看法。

司马光曰：“善理财者，不过头会箕敛耳。”安石曰：“不然。善理财者，不加赋而国用足。”光曰：“天下安有此理？天地所生，财货百物，不在民则在官；彼设法夺民，其害乃甚于加赋。此盖桑弘羊欺（按：汉朝）武帝之言，司马迁书之，以见其不明耳！”争议不已。

熙宁三年（按：1070年）二月，新法既行，物议沸腾；司马光投书王安石，极言新法之害，原书甚长，（凡三千余字）其要曰：

……介甫固大贤，其失在于用心太过，自信太厚而已。何以言之？自古圣贤所以治国者，不过使百官各称其职，委任而责成功也。其所以养民者，不过轻租税，薄赋敛，已逋责也。介甫以为此皆腐儒之常谈，不足为；思得古人所未尝为者而为之，于是财利不以委三司而自治之，更立制置三司条例司，聚文章之士及晓财利之人，使之讲利。……于是言利之人，皆攘臂圜视，銜鬻争进，各斗智巧，以变更祖宗旧法，大抵所利不能补其所伤，所得不能偿其所亡，徒欲别出新意以自为功名耳。此其为害已甚矣！……夫侵官，乱政也，介甫更以为治术，而先施之。贷息钱，鄙事也，介甫更以为王政，而力行之。徭役自古皆从民出，介甫更欲敛民钱，雇市佣而使之，此三者，常人皆知其不可，而介甫独以为可，非介甫之智不及常人也，直欲求非常之功，而忽常人之所知耳。”（以上论养民不当讲求货利。）

介甫于诸书无不观，而特好孟子与老子之言，——孟子曰：“仁义而已矣，何必曰利？”……今介甫为政，首建制置条例司，大讲财利之事；又命薛向行均输法于江淮，欲尽夺商贾之利，又分遣使者散青苗钱于天下，而收其息，使人愁痛，父子不相见，兄弟妻子离散，此岂孟子之志乎？老子曰：“天下神器，不可为也，为者败之，执者失之。”今介甫为政，尽变更祖宗旧法，先者后之，上者下之，右者

左之，成者毁之，矻矻焉穷日力，继之以夜，而不得息，使上自朝廷，下及田野，内起京师，外周四海，士吏兵农，工商僧道，无一人得袭故而守常者，纷纷扰扰，莫安其居，此岂老子之志乎？（以上论为政不当多所变更。）

当时，王安石答书道：

……窃以为与君实游处相好之日久，而议事每不合，所操之术多异故也。虽欲强聒，终必不蒙见察。……盖儒者所争，尤在于名实，名实已明，而天下之理得矣。今君实所以见教者，以为侵官、生事、征利、拒谏，以致天下怨谤也。某则以谓受命于人主，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，以授之于有司，不为侵官；举先生之政以兴利除弊，不为生事；为天下理财，不为征利；辟邪说，难壬人，不为拒谏。至于怨诽之多，则固前知其如此也，人习于苟且非一日，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，同俗自媚于众为善。上乃欲变此，而某不量敌之众寡，欲出力助上以抗之，则众何为而不汹汹然？

元丰三年（按：1080年）三月，上谕王安石曰：“闻有三不足之说否？”

安石曰：“不闻。”

上曰：“陈荐言外人云：‘今朝廷以为天变不足惧，人言不足恤，祖宗之法不足守。’昨学士院进试馆职策，专指三事，此是何理？”

安石曰：“陛下躬亲庶政，无流连之乐，荒亡之行，每事惟恐伤民，此亦是惧天变。陛下顺纳人言，无小大惟言之从，此岂是不恤人

言？然人言固有不足恤者，苟当于礼义，则人言何足恤？故传称礼义不愆，何恤于人言。郑庄公以人之多言，亦足畏矣，故小不忍致大乱，乃诗人所刺，则以人言不足恤，未过也。至于祖宗之法不足守，则固是如此。仁宗在位四十年，凡数次修敕，若法一定，子孙当世世守之，祖宗何为屡自变改？今议者以为祖宗之法皆可守，如祖宗用人皆不以次，今陛下试如此，彼议论必更纷纷矣。”

王船山《宋论》论神宗变法卷六，“神宗有不能畅言之隐，当国大臣，无能达其意而善谋之者，于是王安石乘之以进。帝初莅政，谓文彦博曰：‘养兵备边，府库不可不丰’，此非安石导之也，其志定久矣……夫神宗之误，在急以贫为虑，而不知患不在贫，故以召安石聚敛之谋而蔽天下。然而无容怪也，凡流俗之说，言强国者皆不出于聚财之计。……”

二、论所操之术多异

（客）——王安石对司马光说：“我和你所操之术多异，所以论议政事，彼此不能相合。”司马光是儒家，王安石也是儒家，他们所操之术，何以多异呢？

（主）——据我看来，司马光是儒家，王安石却不是儒家；说得正确一点，王安石盖是名法家。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家，不独管仲、子产、李斯是法家，诸葛亮、王猛、张居正也都是法家，连曾国藩也近于名法家。汉武帝尊信儒术，但他所信用的并非是申公、董仲舒、赵绾、公孙弘那些儒士，而是桑弘羊、张汤、孔仅那些刑名之士。汉宣帝二年（按：公元前72年），皇太子见上所用多文法吏，以刑绳下，